

巷陌之间的“去”与“留”：空间视角下老北京胡同的情感纽带与文化遗产

钟皓¹, 肖梓晗^{2*}

¹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北京

²杜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跨学科数据科学, 美国 德罕

收稿日期: 2024年10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4年11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4年11月28日

摘要

本文通过对北京胡同居民的深入访谈, 探讨了胡同这一富有地域特色的物理空间对居民情感、社会互动及文化认同的影响。胡同的独特空间布局不仅塑造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 还强化了社区的紧密联系和传统文化的传承。然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胡同的物理空间面临着拆迁和商业化改造的挑战, 这不仅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 也引发了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分析以及深入访谈, 揭示胡同物理空间在现代城市化背景下的复杂作用, 为城市规划和文化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北京胡同, 物理空间, 社区互动, 城市化

The “Going” and “Staying” in Alleyways: The Emotional Bonds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Old Beijing Hutongs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Hao Zhong¹, Zihan Xiao^{2*}

¹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²MID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SSRI) at Duke University, Durham USA

Received: Oct. 27th, 2024; accepted: Nov. 21st, 2024; published: Nov. 28th, 2024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钟皓, 肖梓晗. 巷陌之间的“去”与“留”: 空间视角下老北京胡同的情感纽带与文化遗产[J]. 交叉科学快报, 2024, 8(4): 416-425. DOI: 10.12677/isl.2024.84052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hutongs, a physically distinctive space rich in local characteristics, on residents' emotion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Beijing hutong residents. The uniqu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hutongs not only shapes residents' daily activities but also fosters strong community bond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rapid urbanization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he physical spaces of hutongs, including demoli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which transform residents' lifestyles and evoke nostalgia for traditional living as well as concerns about future living conditions.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empirical insights into the multifaceted role of hutong physical spaces amid modern urbanization, offer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urban planning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Keywords

Beijing Hutongs, Physical Space, Community Interaction, Urbaniz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研究背景以及研究目的

北京, 作为一座世界知名的古都, 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其独特的城市布局与历史遗迹如宫殿、庙宇、城墙, 以及保留至今的胡同和四合院, 均见证了北京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 北京逐渐演变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但其传统文化, 特别是胡同文化, 仍然在这座城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

胡同不仅是老北京普通百姓的居住空间, 更是北京城市文化的象征。然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胡同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如拆迁和商业化改造, 这些变化引发了人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胡同的独特空间结构不仅塑造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 也强化了社区的紧密联系和文化的传承。在这种背景下, 探讨胡同空间对于居民情感、社会互动以及文化认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3]。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北京胡同居民的深入访谈, 探讨胡同这一富有地域特色的物理空间对居民情感、社会互动及文化认同的影响。通过对胡同居民过去与现今生活的对比分析, 揭示胡同物理空间在现代城市化背景下的复杂作用。同时, 研究将为城市规划和文化保护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4], 促进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共融。

2. 文献综述

本部分的目的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并为后续的分析奠定框架。通过梳理和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文化身份及其互动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将探索空间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并应用这些理论框架分析北京胡同这一独特空间的作用及其社会意义。

许多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空间都进行了探讨。首先, 在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上, Henri Lefebvre 的《空间的生产》[5]提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这一观点为理解城市空间中胡同的社会构造提供了理论基础。

Lefebvre 认为, 空间不仅被物理地制造出来, 还是通过日常实践在社会中被主动“生产”的, 这种生产是社会力量与物质形态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 胡同不仅是北京这座城市的物理空间, 也是居民社会实践和文化认同的舞台[6]。

“Firstly, physical-nature, the cosmos; secondly, the mental, including logical and formal abstractions; thirdly, the social” Lefebvre 在他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对于空间的三重定义——即物理空间、抽象空间和社会空间。物理空间指的是客观存在的, 有结构的; 精神空间被定义为逻辑的, 即使用者与物理空间所建立的某种联系, 这种空间就包含了使用者心理上和某个特定空间的特殊关系。而社会空间则被定义为在某一物理空间中, 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并且物理空间构建完成后这种空间仍然在建构, 直到这种所谓的空间被个人所内化。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胡同, 可以发现抽象和具象在这个独特的城市环境中的相互交织。胡同既是物理上存在的窄小巷道, 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场所, 同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对胡同的观察和理解, 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城市空间是如何同时包含着物理、抽象和社会层面的, 以及这三个层面如何相互影响, 同时塑造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本研究中, 空间视角作为理解社会关系、文化身份和历史记忆的重要工具, 提供了深入探讨北京胡同文化的切入点。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存在的环境, 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它通过承载和反映社会实践与文化生产, 塑造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认同[7]。在这个视角下, 胡同的物理结构——狭窄的巷道、开放的院落——不仅塑造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 也强化了邻里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社区的文化遗产[8] [9]。

借助 Henri Lefebvre 的“空间生产”理论,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胡同这一空间在社会生活中的复杂作用。Lefebvre 提出的三重空间概念, 即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 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胡同文化的理论框架。胡同作为物理空间, 不仅构成了居民的生活场所, 还在精神层面上承载着他们的情感记忆和历史认同。同时, 胡同作为社会空间, 通过日常的社会互动, 持续建构和再生产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实践。通过这一理论框架, 本研究将探讨胡同的空间如何在现代城市化的背景下影响居民的社会互动和文化遗产。胡同不仅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 更是现代社会中社会变迁的舞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胡同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都在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居民的文化认同和社区生活, 将成为本文的核心讨论内容[10] [11]。

在这样对于胡同空间的三重定义的框架之中, 也诞生出了许多在这个特有的环境里才会有的人和事。而对于这一特殊空间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群体, 一些中国学者也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陈长平, 2010) [12]主要讲述了在胡同里的“边缘人”群体, 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式访谈了三个案例, 用以揭示胡同空间之内的贫困。胡同常常被视作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标签性质的建筑, 但其中有的人却想摆脱胡同, 住进高楼大厦。住在胡同里的一部分人群因疾病而导致贫困, 常常因为支付医疗费用而挖空家里的积蓄。而有的学者(杨青青, 2016) [13]则是通过福柯圆形监狱模型的解读, 进一步阐释物理空间对人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改造, 从而诞生出胡同中的权力实践。另外还有学者(贾晓朋等, 2015) [14]主要通过不同社区类型之间的对比, 表明在物理空间的作用下胡同居民的交通选择, 并且也提到了胡同中的高收入群体比较少, 所以在交通选择上大多数的胡同居民会更倾向于选择自行车或者公共交通。除此以外, 一些学者(杨宜音等, 2008) [15]则是探索出了胡同这一物理空间对于人心理层面的影响——胡同这一物理空间所构建出胡同人心中“精神空间”, 即物理空间对于思维的改造, 即便这些胡同中的居民之后搬离了这一区域, “胡同思维”仍然存在, 其中胡同思维指的是人们在胡同生活中构建出的特殊的与一般社区不同的社会互动方式。在胡同里的人们强调“家长”和“集体”, 比如, 如果胡同中有长者, 年龄较小的胡同居民见面需要向这位长者问好, 并且要尊称“您”。另外, 对于生活在胡同中的居民, 他们更愿意把这一整个胡同称作一个大家庭, 经常会相互拜访或者一起吃饭,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尊老爱幼, 邻里相互帮衬的一种待客模

式[16]。

我们可以看出, 胡同的特殊物理空间首先导致了贫困这一社会现象, 特别是在近几十年北京这座国际大都市处于急剧转型期, 由于向现代性和资本靠拢, 导致保留着传统文化的老北京胡同渐渐淡出主流。这也使得胡同里由于缺乏对于现代性的转型和适应[17], 与时代发展脱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贫困。另外我们也不难看出, 在胡同这一同现代城市截然不同的空间里, 孕育出了特有的“胡同思维”。这些胡同中特有的产物, 也都作用于胡同居民日常生活里的自我呈现。

3. 研究方法及访谈对象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深入了解胡同居民的生活体验与情感认同。定性方法适用于探究复杂的社会现象, 特别是当研究需要捕捉个人的深度感受和细腻体验时。访谈对象为三名居住在胡同多年的居民, 选择标准包括年龄、性别及居住年限, 以确保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访谈问题围绕胡同空间对日常生活、社会互动和文化认同的影响展开, 旨在深入挖掘受访者的个体体验与情感。所有访谈均在受访者家中进行, 每次访谈时长约为 60 分钟, 访谈过程全程录音, 并在事后进行文字转录和初步整理。

3.1. 受访者 A

受访者 A, 女性, 40 岁, 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毕业于西南某 985 大学高分子化学专业。她的丈夫及其家族是胡同的“原住民”。在大学期间, 她结识了现任丈夫, 并在结婚后于胡同生活了 10 年。此期间, 她对胡同的生活方式和社区文化产生了深刻的理解和情感连接。孩子上完小学后, 因工作原因, A 和丈夫搬入了现代化住宅。A 的经历使她对胡同生活方式产生了独特的情感和看法, 她在怀念胡同温馨的同时, 也适应了现代住宅的便利和舒适。

3.2. 受访者 B

受访者 B, 女性, 45 岁, 拥有北京西城区户口, 是一名自由职业者(纹身师)。她未婚, 父母在其儿时离异, 她与母亲及外婆曾长期居住在北京的胡同中, 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大部分成年时光。她的工作性质灵活, 生活较为闲适, 热爱旅行和绘画, 曾到访多个国家, 包括欧洲和东南亚。尽管胡同生活充满了回忆和情感连接, 但出于经济和工作等多方面考虑, 她最终选择搬入现代化小区。她认为现代小区的隐私性和设施更符合其当前生活需求, 然而, 她有时也会怀念胡同的温馨氛围和社区文化。

3.3. 受访者 C

受访者 C, 女性, 68 岁, 自幼与父母在胡同中长大, 对胡同有着最为深厚的感情。因北京房屋拆迁政策, C 搬离胡同, 迁至北京朝阳区某小区, 现如今成为社区内残疾人救助站的社区工作者。她对胡同的情感联结深厚, 对新生活的感受也复杂。虽然新居住地提供了更现代化的设施和便利条件, 但她依旧怀念胡同独特的社区文化和人际关系。她在新环境中积极参与社区工作, 努力重建那份熟悉的温暖与支持。

4. 胡同的物理空间对于邻里关系的构造

胡同作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独特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结构对邻里关系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胡同的物理空间特征主要包括平房建筑、狭窄的巷道和公共的院落。根据 Henri Lefebvre 在《空间的生产》中的理论, 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的, 而且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通过对胡同居民的访谈和上述文献对于空间的阐述, 我们可以深入理解胡同这一物理空间如何影响居民的社交网络、社区互动和文化

认同[18][19]。

“我们家的平房在地安门词汇胡同，有正房、耳房和厢房，现在那个院子都收回了，恢复了四合院的原貌。”
(受访者 C)

“胡同的巷道狭窄，有时候前面搭个小棚子出来做饭。让出一米来，就给自己多点空间。”(受访者 B)

相比于现代化的小区，高层建筑和独立的居住单元，胡同的空间更为紧凑和开放。平房结构使得住户之间的距离更近，狭窄的巷道和公共的院落则为居民提供了频繁互动的场所。这种物理空间的安排自然地促进了邻里之间的日常交流和互动。

胡同的物理空间不仅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社交网络和邻里关系。在胡同中，居民们更容易形成紧密的社交网络，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这主要得益于平房结构和公共空间的存在，居民们在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形成了强大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

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许多胡同居民对街坊四邻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共同庆祝节日，形成了独特的社区文化。例如，受访者 C 提到，在胡同中，邻居们经常一起吃饭、聊天，遇到事情相互帮忙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连接。

“过去，大家互相帮助。比如，有人家的烟囱堵了，煤气中毒，邻居都会来帮忙拆烟囱，救人。”

但在这邻里相处和谐的胡同之下，也并非一切都是其乐融融。尽管受访者 A 在访谈中多次提到这种胡同式的扁平化建筑结构决定了其邻里关系更加亲密和紧密，但在一项关于大栅栏的研究中提到胡同中居民们在公共院落中努力划分私人空间，维持隐私，导致了公共空间利用上的冲突和邻里关系的紧张(李阿琳 2019) [20]。通过访谈中我们也得知，受访者 B 和 C 在胡同生活中同样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胡同的空间结构大多数错综复杂，在一个院子里可能有多户共同居住，所以不同家庭所共享的公共空间有着一定的差别。比如说靠近大门口的住户其可能拥有更多的公共空间支配权，或者说有更大的可能“占领”整个院子居民的公共空间。如果其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私人空间拓展到了公共空间影响到了其他住户日常生活，矛盾就有可能因此产生。

“你要说你在(胡同院子的)里头的跟在(胡同院子的)外头的又不一样了。是我自己的那你要是在外头住平房，我在(胡同院子的)里头(的空间)全是我的，没人过，那是外边这个(胡同的公共空间)，住在院子外面的人想占用一点公共空间拿来盖厨房，那你这道要留窄了，人家不就该有意见了。你在门口外面你也不能搁东西，你搁东西人过不去。”
(受访者 C, 60 岁胡同居民)

在访谈中我们得知，尽管因为胡同面积狭窄，又一个院子居住了好几户人家，公共空间的争执不可避免，但同时也是正因为胡同这特殊的空间构造，强行赋予了居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这种特殊居住模式，也让居民们不得不维护他们的邻里关系。因此，为了维护这种长期友善的邻里关系，居民们也会通过协商沟通的形式去商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的划分，并制定一种不成文的、大家心照不宣的“界限规则”。

综上所述，胡同的物理空间通过促进频繁的邻里互动，塑造了强大的社区意识和紧密的社会关系。这不仅支持了 Lefebvre 关于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也揭示了胡同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社会功能。

5. 胡同空间对家庭及社会关系与传统文化礼仪传承的影响

胡同作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结构对家庭关系和传统文化礼仪的传承有着深远的影响。胡同的物理空间主要由平房、狭窄的巷道和公共的院落组成。这种空间布局直接影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家庭结构。例如，受访者 C (60 岁，胡同居民)提到：

“胡同的话就是一大家子都住在一块, 其他地方的话, 感觉就是都住楼房里, 分布在城市的各个位置, 逢年过节或者婚丧嫁娶才来聚聚。而胡同的话基本就是大家住在一块, 离得不远。”

在胡同, 多个家庭成员经常同住在一个院子里, 这种紧密的空间安排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 也更容易形成紧密的家庭纽带。由于居住空间的限制, 胡同居民往往会通过共享公共空间来进行家庭活动, 例如共同做饭、用餐等。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 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受访者 A(40岁, 公司老板)在她的回忆中提到:

“因为我是和我丈夫以及我丈夫的父亲一起在胡同中生活的, 所以基本上平日里的生活都是在一块的, 带孩子之类的我的公公(其丈夫的父亲)也能给予我帮助吧, 这让我在工作之余家庭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根据访谈内容可以看出胡同中的家庭结构多为主干家庭。乔治·默多克和皮特·拉丝莱特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来理解这种家庭结构的优势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其中, 乔治·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k)是核心家庭概念的主要提出者之一。在其著作《社会结构》(1949年)中, 他将核心家庭定义为一个由父母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单位。默多克通过对全球各种文化中的家庭结构进行比较研究, 强调了核心家庭在社会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对于大多数现代化家庭而言, 其家庭结构为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指一对夫妻与其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 也包括只有夫妻二人的家庭、夫妻一方与其子女所组成的家庭。皮特·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在其历史社会学研究中, 对欧洲家庭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提出并使用了主干家庭的概念。主干家庭指的是一种多代同堂的家庭形式, 通常包括祖父母、父母和子女, 甚至可能包括其他亲属。这种家庭结构在前工业社会中特别常见。对于胡同中家庭而言, 大多数的胡同居民的家庭结构都是主干家庭。胡同作为传统社区, 其居民多以主干家庭形式生活, 这不仅反映了文化传统的延续, 也体现了多代同堂在社会支持和家庭纽带方面的优势。这样的家庭结构在面对社会变迁和经济压力时, 能够通过代际合作和支持, 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和情感支持。

然而, 胡同的空间限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 原有的居住空间变得越来越拥挤, 导致一些家庭不得不搬离胡同, 寻找更大的居住空间。受访者 C(60岁, 胡同居民)提到:

“因为物理空间的原因, 空间太小, 没有个人的厨房、卫生间, 拥挤。现代小区的设施会变好。”

这种迁出胡同的现象表明, 尽管胡同的生活方式具有其独特的魅力, 但物理空间的限制使得部分家庭难以长期维持在胡同的居住。

“但是那块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几个人挤在那里其实很不舒服”。(受访者 B, 40岁纹身师)

“但随着家庭的延续, 对于他们而言, 这种大杂院已经容不下那么多人了”。(受访者 A, 公司老板)

尽管空间结构对长期生活有制约, 但胡同中这种特殊的空间结构与生活方式也对文化传承以及传统礼仪的保留提供了重要场所。在胡同中, 居民之间的互动频繁, 这为传统礼仪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受访者 B(45岁, 纹身师)提到:

“和邻居之间关系还是不错的, 至少要比小区之间要联系更多。但有时候其实也会有矛盾, 比如有的邻居会在公共位置上放自己的物品, 比如好久都不用的柜子, 或者一些花什么的, 有的时候感觉会占用个人公共空间。我会尝试沟通, 基本上都能解决, 但这种事情也会经常发生。”

这种频繁的互动和沟通, 实际上也在无形中强化了传统礼仪的传承。

此外, 胡同的生活空间还促使居民们在节日和特殊场合共同庆祝, 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受访者 C(60岁, 访谈居民)提到:

“你出门进门都能看见, 或者院里有什么事儿一招呼全来了, 大家互相串门儿, 聊聊天, 一起活动。”

这些共同的活动和仪式, 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也是对社区成员身份和归属感的强化。比如说胡同的居民特别强调他们的“老北京”的身份。由于胡同的特殊地理位置, 其属于北京的市中心地带。按照胡同居民的说法是“皇城根脚下”, 这是因为大多数胡同居民居住在古时北京皇城的附近。这也使得他们同新北京人区分开来。在访谈过程中, 这些访谈对象都曾提到, “二环之外无胡同”。而二环以外是北京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进行的开发, 因此在胡同居住等于在二环里居住, 在二环里居住就意味着他们在北京的身份的“正统”, 也因此无论是胡同居民本身, 还是后来随着城市发展而迁入北京的新北京人都会给在胡同居住的居民冠以“老北京”的标签。

这与上述文献分析中的理论相呼应, Henri Lefebvre 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 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不仅被物理地制造出来, 也通过日常实践在社会中被主动“生产”。胡同的物理空间正是通过这种社会关系的生产, 形塑了居民的家庭关系、社区的文化礼仪以及个体的身份认同。

胡同城市结构, 在微观层面有形塑作用, 同时对于宏观上的社会阶层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Manuel Castells (1972)在《城市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途径》[21]中分析了城市结构如何体现和加强社会阶级结构, 胡同的改造和商业化进程也体现了这种社会阶级的变化和冲突。近年来, 胡同中的许多老住户被迫迁出, 而这些地区则被改造为高档住宅和商业区, 吸引了更多的富裕阶层和企业。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北京前门大街一带。这个地区原本是一个密集的居民区, 拥有许多历史悠久的胡同。然而, 为了配合 2008 年奥运会的现代化需求, 大量胡同被拆除, 数万居民被迫搬迁或被驱逐。新的开发项目包括高层建筑、办公楼和购物中心, 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冲突。当地居民每平方米获得约 1000 美元的补偿, 而开发商计划将重建后的四合院以五倍的价格出售。在杨梅竹斜街, 胡同的改造使得这个历史街区重新焕发了活力。这个区域曾经布满晾衣绳和杂乱的电线, 现在则充满了文化创意商店、手工艺作坊和迷你博物馆。然而, 这种改造也引发了居民对传统生活方式被侵蚀的担忧。

这些改造项目不仅改变了胡同的物理结构, 也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结构, 体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阶级冲突的加剧。较富裕的阶层和企业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居民, 传统社区的紧密社会关系和文化逐渐被商业利益所取代, 胡同的腾退和改造使得原有的社区结构发生变化, 居民们的社交网络和家庭关系也受到影响, 原有的社交网络随着胡同这一传统物理空间的瓦解或改造, 开始逐渐稀释。比如受访者 B (40 岁, 纹身师)提到:

“很多人和我一样也搬离了胡同, 一般有事才会联系。”

综上所述, 胡同的物理空间对家庭关系和传统文化礼仪的传承有着重要影响。尽管现代化的小区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而且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来说, 现代化的小区对他们更有吸引力, 即使年少时居住胡同, 但由于个人发展、消费、子女教育以及其他的种种原因, 他们还是更愿意搬入设施更为便利的现代化社区。

6. 迁入与迁出

本部分将探讨胡同居民在迁入与迁出过程中的空间体验, 这与本文对胡同作为社会空间的研究主旨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居民对新旧空间的适应和认知转变, 可以揭示胡同空间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意义。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胡同的拆迁对于家庭社会关系的影响, 根据统计数据调查北京的胡同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大规模的拆迁和改造。自 1949 年以来, 胡同数量大幅减少。1949 年, 北京有约 3050 条

胡同, 到 1990 年减少至 2250 条, 而在 2004 年仅剩 1300 多条。这种大规模的拆迁和改造导致了许多原住民被迫搬迁, 原有的社区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2]。

北京的胡同改造项目不仅包括拆迁, 也涉及商业化和现代化改造。例如, 杨梅竹斜街的改造项目成功将其转变为文化创意商店和迷你博物馆集聚的历史街区, 恢复了胡同的历史面貌, 同时提升了基础设施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尽管有一些胡同被保护并进行文化复兴, 但仍有大量胡同在现代化进程中消失。根据一些报道, 约有 90% 的原有胡同已经被拆除或改造。这些拆迁和改造项目在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同时, 也带来了社会流动和居民的迁出, 反映了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复杂的社会经济影响。

而在我们的访谈中,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老人不愿意搬出胡同, 尽管子女们都离开, 但他们自己仍居住在胡同中。或者一些老人, 尽管迫于拆迁政策的影响使其搬出了胡同, 但也仍保留着“居住惯性”。对于胡同中的老人而言, 他们更不愿意搬出胡同, 原因是他们对于胡同有着更深刻的感情, 胡同承载着他们童年、青年时代的记忆。他们在胡同中已经形成了社交生活圈。这种生活惯性使得他们不愿意改变当前的现状。同时, 现代化小区和年轻人对他们而言并不具备很强的吸引力。相反, 现代化小区相对独立和隐私的空间让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融入, 新式防盗门、防盗锁以及更为密闭的空间让他们无法与街坊四邻进行沟通, 对他们而言, 这是无法接受的。

同时, 对于那些已经搬入了现代化小区的老胡同居民来说, 由于政策性的强制迁入, 使得他们不得不融入到现代化小区的生活模式之中。但在访谈中我们可以得知, 即使搬入了现代化的小区, 这些胡同中的老居民也同样愿意参与到社区志愿服务当中去。比如受访者 C, 再搬入新社区中之后, 她一直从事社区中残疾人帮扶项目之中, 她在访谈中提到, 正是因为前几十年的胡同经历, 让她形成了乐于助人积极帮助周围人的性格。同样地, 比如受访者 B (40 岁, 纹身师) 的母亲, 在胡同社区时就特别热爱舞蹈, 到了新社区中, 她也会经常和她的同龄人们一起跳舞。由此看来, 胡同给他们带来了很强的生活惯性, 这种生活惯性使他们在面对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和影响下, 仍然大量地保持着之前的生活模式, 仍然具有“胡同思维”。从社会学角度来看, 胡同的拆迁与改造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步骤, 也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居民对新空间的适应过程, 也反映了胡同这一特殊空间在文化认同上的深刻影响。

如今, 许多的胡同渐渐淡出视野, 但也有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被保留了下来。除了有大量的商业体入驻, 由于部分胡同的居住空间和相应功能仍然存在, 因此也有不少新居民迁入的现象。比如一些搬出胡同的北京人将自己的房间通过租赁的形式提供给来京务工人员。这也就意味着胡同的社会关系变得复杂了起来, 外来务工人员这一“新血液”的进入, 在与胡同原有居民和生活方式融合的过程中, 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给胡同带来了新的社会动态和文化碰撞。老居民在适应新居民的同时, 也需要面对由此带来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差异。例如, 传统的胡同居民习惯了社区的紧密关系和互帮互助, 而新迁入的务工人员可能带来更为独立的生活方式。不同生活方式的碰撞, 可能会在初期引发矛盾,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可能通过互动和交流, 形成新的社区文化。

通过对胡同居民迁入与迁出过程的分析, 本文揭示了空间变化对文化认同的深远影响。这一发现不仅支持了空间生产理论, 也为理解胡同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延续和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7. 胡同的“旧”与“新”：居民对于过去和现状的看法

本部分讨论胡同在现代城市化背景下的“旧”与“新”之间的矛盾, 这一讨论直接涉及本文关于胡同文化如何在现代化冲击下保持与转变的核心议题。通过这一分析, 我们可以更深入理解胡同作为文化符号的变迁过程。

随着改造、城市的商业化进程带来的迁入与迁出, 胡同这一名词已经成为人们过往生活回忆的载体, 从访谈中看出访谈对象们对于胡同都有着自己的回忆。对于受访者 A (45 岁, 公司老板) 来说, 胡同是一段悠闲与美好的时光。比如她提到老北京人那时候养的鸽子哨, 是那段时光的标志。

“就是那会儿鸽子哨你知道吗? 那鸽子‘嗡嗡嗡嗡’的那时候是非常多的, 就是很明显。那时候北京的天也比较好, 然后呢看冬天就是很冷很干燥, 有那个鸽子哨特别有北京特色, 但是现在基本上在胡同里头已经听不见了, 就包括现在我们住在那边就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感受了。然后比如说现在这种老北京也比较少了, 而且像一些北京文化的东西, 比如就像我刚才说的, 鸽子这些, 其实政府这种监管不让养, 现在也比较基本上没有人养鸽子了, 所以这些就很少了, 基本上就没有了。”

胡同是过去生活的符号, 承载着人们的感情寄托。然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这些符号逐渐消失。一些生活细节如鸽子哨也随之消失。过去, 人们养鸽子主要是出于喜欢和生活节奏的需要, 但在当代社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快速发展(如科技进步和国外流行文化的影响)使得生活更加丰富, 生活节奏变快, 导致传统文化和爱好的传承中断。

另外受访者 C (60 岁, 胡同居民) 也提到了在儿时的胡同中, 小朋友们进行的集体游戏, 比如跳皮筋、滚铁环。但随着搬入了现代化小区, 这种在胡同中的游戏形式也淡出了大众视野。

另外关于胡同现状的看法, 在调研中笔者也特意关注到了胡同商业化给传统胡同空间所带来的冲击。受访者 A 提到, 胡同商业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符号的宣扬, 比如南锣鼓巷的改造。但 A 认为由于商业化气息严重可能会对商业化改造地点周围的胡同居民产生影响, 比如说交通问题, 扰民等等。另外受访者 C 在访谈中也提到现如今商业化气息浓重, 改造没有很好地保留胡同中本应具有的风格, 没有很好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模式进行融合。这说明胡同的商业化目前来看仍有需要改进的空间。在社会层面上来看, 胡同文化确实具有价值, 但如何与商业进行融合并去打造属于北京胡同独一无二的特色, 以及在融合之后如何保证在胡同中那些遗留的居民的正常生活是当下政府所面临的挑战。

胡同在现代化冲击下的“旧”与“新”之间的张力, 反映了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复杂演变。本文通过这一讨论, 进一步深化了对胡同作为文化符号的理解, 表明了空间在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8. 结论

胡同作为北京特有的城市空间, 不仅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也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推进, 胡同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符号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和商业化改造。然而, 胡同的改造和商业化进程也影响着胡同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变动以及其社会关系的重塑, 这反映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复杂的社会经济影响。

首先在个人层面, 胡同曾是居民们生活和情感的寄托。胡同中的人们通过紧密的空间和频繁的互动, 形成了独特的社区文化和家庭纽带。然而,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 这些生活细节和情感联系逐渐消失, 许多原住民被迫迁出, 寻找更大的居住空间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其次在集体层面, 胡同的改造和商业化改变了原有的社区结构^[23], 导致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断裂。尽管有一些胡同被保护并进行文化复兴, 但仍有大量胡同在现代化进程中消失。商业化的改造项目虽然带来了经济收益和现代化设施, 但也引发了居民对传统生活方式被侵蚀的担忧。最后在国家层面, 保护和改造胡同成为文化政策的重要部分。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试图在现代化与历史传承之间找到平衡, 保护胡同的文化遗产, 促进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共融。然而, 这一过程中仍面临许多挑战——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模式进行有效融合, 以及如何在改造过程中保护原住民的生活权益等。胡同的保护与改造, 需要在文化传承与现代化发展之

间找到平衡点。政府和社会应关注胡同居民的生活惯性和情感需求, 在推进城市发展同时, 保护和延续胡同文化, 使传统和现代和谐共存。

总之, 胡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见证了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动。通过对胡同居民的访谈和文献的讨论, 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这种独特的城市空间如何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 并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 [1] 张婉婷. 中国电影对北京城市形象的建构[J]. 青年记者, 2015(11): 40-41.
- [2] 李河. 从根系式生存到漂泊式生存——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生存论解读[J]. 求是学刊, 2018, 45(2): 17-26.
- [3] 于小植. 留学生视域中的北京胡同意象[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4(2): 153-156.
- [4] 毛琦. 北京城市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虚拟传播——以胡同与四合院文化传播为例[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 35(5): 149-150.
- [5]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7] [法]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 汲喆,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8]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lackwell.
- [9] Soja, E.W. (1996)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Blackwell.
- [10] Simmel, G. (1903)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Wolff, K.,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Free Press, 409-424.
- [11]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2] 陈长平. 胡同大杂院中的贫困——人类学都市个案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7(3): 18-26.
- [13] 杨青青. 胡同生存空间中的权力实践——福柯圆形监狱模型的再解读[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83-86.
- [14] 贾晓朋, 孟斌, 张媛媛. 北京市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 34(1): 55-59, 70.
- [15] 杨宜音, 张曙光. 理想社区的社会表征: 北京市居民的社区观念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5(1): 109-123.
- [16] 马建农. 北京四合院、胡同情结的文化思考[J]. 前线, 2010(3): 61-62.
- [17] 梁晨晨. 北京胡同之根——砖塔胡同的前世今生[J]. 北京档案, 2023(3): 58-60.
- [18] Zukin, S. (1991)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 李阿琳. 空间中的行动: 大栅栏院落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调整[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19, 36(1): 44-59.
- [21] Castells, M.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Edward Arnold.
- [22] 许聃. 总书记的牵挂 老胡同 新生活[EB/OL]. 中国日报网.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1/24/WS63cfe0e3a3102ada8b22c7bd.html>, 2023-01-24.
- [23] 张慧瑜. 大众文化中北京形象的流变[J]. 艺术评论, 2016(2): 114-118.